

(上接B01版)

### 评完奖,作品就成了摆设

如果不评奖,对于老顾,以及与他经常合作的某文艺协会主席老李来说,那意味着少了一个赚钱最快的渠道。“评奖成了一个大礼包。”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说,“有钱的人,有权的人,都动起来了。”回想过去的时光,老李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当初文艺协会联合企业办一个比赛,评审都是自己的人,每次当评委,能拿到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报酬,这笔钱从企业冠名费中抽取。而能评上官方参与设立的奖项,文艺工作者们也赚足了面子。孙立生回忆,曾经有位画家取得了某个协会的奖项以后,原来一幅作品的价格直接上涨了一倍。还有位作家,曾经找到山东群众文化学会副秘书长,请他帮忙卖5000册书,后来这本书获了茅盾文学奖,紧接着就销售一空。当时还有一个号称唱歌能治病的女歌手,甚至力压华语一姐,获得了最受欢迎奖。山东音乐学院副教授李如春透露,有的民间音乐大奖,就是几个大公司商议一下,共同选出今年要推的艺人,然后一人分一个奖。评奖,成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工具。



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曾多次痛批文艺评奖过程中的不正之风。(资料片)

# 大刀向文艺奖头上砍去



鲁迅文学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不是一回事。“落马”官员、佛山市政协副主席廖东明曾是第九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得主。(资料片)

只要名头响亮,老李根本不愁没有参与者。而跟老李有同样想法的人和机构还有很多,基本上每个行会、协会都有评奖,甚至有些全国奖都在区一级组织评审。平日里,有很多协会成员主动找上老李,想在协会拿个奖。孙立生回忆,有些曲艺奖项,最后都是颁给了自己人。比如走出落马官员的鲁迅文学艺术奖,还有不少获奖者是作家协会的成员。现在,老李觉得,如果奖项减少,就会少了很多暗箱操作,有限的奖项不可能满足有需要的人们,无论领了谁的人情,都会得罪其他人。还是交给评委,凭实力说话,是最稳妥的办法。曾经常作为评委的孙晓,如今只想坐在书桌旁,安心地阅读参赛者的稿件,他觉得这样才是文艺工作者想要的比赛。而不是因为奖项繁多,只能留给评委一点匆忙评选的时间。他说,有次评选广播剧,甚至只能听完第一集,几天时间就看完一大摞小说,有的评委只看看标题和简介,就写下意见。还有一个电影评委,评完奖大汗淋漓,一共评出200多个奖,因为哪方利益都需要顾及。而老李通过朋友认识的文化传播公司的小刘,最近也在发愁,他在考虑,奖项减少了,以后要不要发动所有员工,出去寻找企业洽谈做企业文化的生意。由于老李跟企业打交道少,办比赛的工作就外包给小刘,通过他的关系与企业合作,最后费用平分。而最让小刘赚钱的,是接到政府外包给他的“制作费”,做成有关部门需要的作品,让政府部门参与评奖。比如曾经接到一个主旋律微电影的拍摄,反映某建委的业绩。很多片子评完奖,也就成了摆设。孙立生很为这种“浪费”痛心,因为评奖的作品和给老百姓看的作品,往往是不一样的,作品获奖后被白白扔掉,是常有的事情。由于评奖所带来的利益,评委的喜好常常会成为创作的方向。“艺术没有标准来衡量。”孙立生说,文艺创作的题材是长期积累,偶然得之,就像是遇到恋人一样,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但参照物变成获奖了,评奖市场越来越大,把艺术本质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规律彻底打乱了。有的奖项要求的时间很短,作品成了“急就章”。而现在,评奖减少,作品似乎也在渐渐回归。孙立生觉得,文艺工作者们应该借此深入到民众之中,了解他们的生活,写出接地气的作品。因为奖项的减少,“急就章”失去了市场,文艺工作者们就会安心创作。说不定,一些民间小调也会重新发展起来,而不是因为它们无法登上主旋律大奖的舞台,长期受到忽视。但老李开始担心,之前获的奖项被撤销了,会不会让曾经的获奖者觉得手中的奖也贬了值,如同一个引以为傲出身名校的学生,母校突然被取消的感觉一样。孙立生却认为这是好事,时间久了,留存奖项的含金量就越来越高,而不是奖项决定了作品的走向。大红包飘走了,一切渐渐按部就班,然而真的是这样吗?

### 奖没了,文艺还要“活”下去

“奖不是重要的,要看奖背后是什么?”方方说,“奖项后面政府介入太深,政府介入后,把住房、职称、工资全部和奖项挂上钩。经常唯一化,就是你拿到一个奖,不管你这个人好不好,水平高不高,都无所谓。”老李担心,托关系的人不会因为奖项的减少而减少,反而数额会越来越大,因为奖项缩减,大家一窝蜂地去争仅存的奖项,竞争越来越大。对他们而言,当奖与太多东西挂钩时,奖意味着职位、未来和前途。当一位艺术家再一次向某省宣传部提出,我们的作品缺点是“高大全”时,宣传部的领导像往常一样摇摇头,说“没办法,奖就只会颁给这样的作品”。孙晓记得,在有些城市,作者获得一个国家级文艺大奖,政府会奖励一套房子。不为别的,因为这是政绩的体现。所以,一个事业单位的编辑最近辞了职,他与同事所编辑的一整套丛书,最后却署上了领导的名字。他们所获得的费用,甚至还不如一个领导所谓的“评审费”高。他们的辛苦,被变成了上级的政绩。“评价体制改变不了,奖项依旧是追逐的目标。”老李笑笑说。艾君并没有觉得文艺评奖的删减,会带来太多的改变,虽然增加了竞争力,对提高品质扩大某一奖项的社会影响力有利,但如果不制定科学的合理的标准、加强科学监督和管理机制,利益链条的强度就会加强,长度就会伸延,对打破这种利益格局难以有实际作用。“就像是一个人患病了,不能像西医治病那样对具体病下药或治疗,而要像中医进行各部位系统综合分析和调理。”老李明白,只要有利益的需求,就难免暗箱操作的产生。他不敢说,如果真的有事关自己前途命运的人找来,他还会拒绝吗?毕竟获奖成为硬杠杠的同时,评奖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。老李有时候也会想,把奖都取消了好,也没了那么多烦心事。但同时,他又止住了这个念头,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标杆、一种鼓励,当然,前提是能回归原来本质的话。“奖不是问题,关键在于你怎么看。”方方说,如果是一种鼓励,不带有任何政府的介入和利益的挂钩,那么多少也无所谓。“奖应该就像是过年一样,喜庆一下,但是年过去了,日子还照常过。”她说,就像没有诺贝尔奖,莫言也会一直写下去一样。



## 湖南卫视再无胡南

本报记者 徐瀚云

“今天湖南大雨……”5月8日中午,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发了一条简短的微博,悼念《快乐大本营》制作人胡南。胡南于2015年5月5日晚因病去世,年仅40岁。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幕后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位曾带给人们无限欢乐的女制作人。5月7日,李湘在微博中写道,“翻看朋友圈,你还在……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……亲爱的,在天堂好好照顾自己。”电视导演汤浩也在微博里写道,“一路走好,才女胡南,我的人门老师、好搭档、好朋友。天堂里没有病痛,你会是开心的天使。”我们并不熟悉胡南,作为幕后工作者,她注定不会像台上的主持人那样闪耀。胡南生于1975年,是芒果台有名的才女,曾担任湖南经济广播电台主持人,湖南都市频道音乐节目制作人。2003年后,胡南开始致力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电视节目模式,参与多个影响很大的节目本土化改造。大家熟悉的《快乐大本营》中的“科学实验站”、真人秀《极速前进》、明星亲子益智历险闯关节目《疯狂的麦咭》都是胡南参与从海外引进的节目。作为一名电视制作人,胡南经历过湖南台最为艰苦的岁月,在一步步前行中,她的成熟和能力为人所有目共睹,她参与导演和制作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无限的欢乐。无论加入团队,还是自己带领团队,再或者是自己组建团队,胡南一直都处于“创业阶段”、“创业状态”。因此,她永远忙到马不停蹄。也因为太忙,恋爱常常花开无果,最后也就一直没有成家,也一直没有孩子。还因为太忙,她最终住进了医院,告别了这个世界。一向以女强人形象示人的胡南,离世时无家无子,孑然一身,叫人心酸。湖南台副总编辑周石兴发文悼念胡南,他这样写道:如果有来生,你再也不不要问有什么意义,你要记住,活着,就是意义;如果有来生,你再也不不要问;你最好的作品是什么,你要知道,你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;如果有来生,你不要这么出类拔萃,不要这样争强好胜,不要这样追求完美。胡南生前,有人劝她,如果有来生,就做一个平平安安的女儿,就做一个平平庸庸的朋友,就做一个平凡平凡的常人。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卓绝的风华而呵护你,不会因为你天纵的才情而怜惜你,不会因为你高贵的心性而珍爱你。你的存在,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所在。